清史研究前沿·政治制度与政治史

清代内阁学士职掌与地位的演变

陈永祥

［摘要］ 清代内阁学士源于入关前设置的内三院学士，其职掌与地位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入关前后，内三院学士的职权和地位受到较大的限制，扮演的主要角色是皇帝的文学侍从。顺治帝亲政后，学士得以参与章疏票拟与批红，地位得到提高。康熙帝亲政以后，学士参与政务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职任紧要的参赞政事之臣。雍正朝以后，受政务文书、中枢决策机制、中央权力分配格局、皇帝理政方式、内阁职能等变化的影响，学士的职权和地位逐渐弱化，最终沦为无所事事的“冗员”。内阁学士职掌与地位的曲折变化，从根本上说是皇权不断强化的结果。

[关键词] 清代　内阁学士　职掌　地位　皇权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8587（2026）– 02 – 0039 – 013

内阁作为清代最重要的中枢机构之一，向来深受研究者的重视。以往的相关研究注重从中枢权力运行机制的角度探讨内阁体制在有清一代的发展演变，涉及内阁的沿革、职掌、职官、运行机制、性质与地位等方面，成果颇丰。[①] 在内阁职官方面，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士（包括协办大学士），对大学士以外的内阁职官则鲜有专门研究。[②]

内阁学士是清代内阁中地位仅次于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的高级职官，亦为清代职官体系中的重要设置。关于内阁学士的职掌，乾隆时敕修的《大清会典》《清朝通典》《清朝通志》等政书将之归纳为“掌敷奏本章、传宣纶綍”。[③] 这不仅为后来的官修政书沿袭，也影响到后世对内阁学士地位的认识。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清代内阁学士职掌与地位的认识大抵不出此范围。

［收稿日期］ 2025–05–13

［作者简介］ 陈永祥（1988—　），男，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南宁 530022，chencyx123@163.com

① 刘文鹏、杨瑞：《百年清史研究史·政治史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128–145 页。

② 学术界关于清代内阁大学士的研究成果较多，参见程广媛：《晚清大学士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何瑜、程广媛：《清代总督大学士简论》，赵志强主编：《满学论丛》第 1 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 年，第 70–83 页；刘洋：《清朝大学士班次问题初探》，《历史档案》2011 年第 1 期；刘洋：《清代内阁大学士兼任军机大臣考论》，《清史研究》2025 年第 2 期；刘洋：《清代大学士差遣体制初探》，朱诚如、徐凯主编：《明清论丛》第 18 辑，故宫出版社，2018 年，第 184–192 页；杜望：《康熙朝大学士职能述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北京史学》2022 年春季刊（总第 15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年，第 251–283 页。关于大学士以外的内阁职官的研究成果，目前所见，仅有秦国经《内阁中书周福清——新发现的关于鲁迅祖父的档案材料》（《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 年第 1 期）、陈佳《清代中书舍人在馆阁体发展中的影响研究》（《美苑》2009 年第 6 期）两篇文章。

③ 乾隆《大清会典》卷 2《内阁》。

然而，清代内阁学士的职掌、角色与地位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远非寥寥数字可以概括。本文拟系统考察内阁学士职掌与地位在清代的演变情况，以丰富对清代内阁职官和内阁制度的认识。

一、入关前后内院（内阁）学士职权的变化

清代内阁学士源于天聪十年（1636）三月改文馆为内三院后设置的内三院学士。①顺治十五年（1658）改内三院为内阁，内三院学士各以礼部侍郎改兼殿阁衔，十六年又定内阁学士俱以原官留任，缺出不补，十八年复改内阁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仍设学士。康熙九年（1670）再次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其后沿用不变，学士仍以礼部侍郎兼殿阁衔，次年罢兼殿阁衔，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成为定例。②与内三院、内阁的名称变动相似，学士的人数和品级变动也比较频繁。入关之前，内三院学士无定员，均由满人和汉军旗人担任。顺治元年设满学士、汉军学士各三员，并增设汉人学士，无定员。此后，学士人数增减不一，至康熙十年定满学士六人、汉军学士二人、汉学士二人，十二年以汉军学士并入汉缺，共四人，学士人数由此固定下来。③学士的品级在清初因满洲、汉军、汉人的身份差别而间有不同。满洲、汉军学士初为二品，汉人学士为三品，顺治十五年俱改为正五品，以兼礼部侍郎衔，从侍郎品级为正三品，康熙九年定为正三品。雍正八年（1730）定侍郎为从二品，内阁学士以兼礼部侍郎衔为从二品。至雍正十三年，吏部议准将内阁学士品级改为从二品，沿至清末。④

在清代职官系统中，内院（内阁）学士虽然设置较早，但其职掌长期缺乏明确的界定。一般认为，清入关前的内三院在职掌与地位属性上与此前的文馆无异，仍属于以文学侍从为核心职能的文书机构。⑤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入关前的内院学士虽然有传宣谕旨、代奏军政事宜、奉使出差、审理案件、参议典礼等情形，但其角色与大学士一体，是以记注国史、纂修实录、翻译典籍、撰写文书为主要职能的文学侍从之臣。入关之初，内院地位虽然得到抬升，成为文职衙门领袖，大学士参与政务，获得票拟之权，并发挥顾问咨询、献替可否的作用，但彼时内院的职权和作用还相当有限，"所票拟者，不过官民奏闻之事而已"，⑥部院本章则不经内院票拟，由各部院面奏取旨，至于用人行政要务，如无特许，内院亦不得与闻。所以有学者认为，顺治初年内三院的职能与崇德时期相比并无实质改变。⑦直至顺治帝亲政后，情况才发生改变。顺治帝一方面允许并鼓励大学士、学士积极建言献策、参酌章奏，另一方面又对本章的批答进行改革，使内院（内阁）得以全面参与票拟、广泛参预机务，地位得到提高，成为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重要中枢机构。随着中枢决策机制和本章批答改革的推进，学士的地位得到提升，获得参与机务的权力。

一方面，学士获得参与票拟的资格和权力。早在入关之初，内院即已获得部分本章的票拟之权。但当时票拟由大学士负责，学士参与票拟的时间较迟。顺治十年正月，顺治帝鉴于各部院本章面奏得旨后由部院录旨再送内院批红发科，每致错误，经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部院本

---

① 内阁学士由内三院学士发展而来。在康熙九年以前，虽然内院、内阁之间名称历经变更，但实际上对学士职掌与地位的影响并不大。故本文在讨论过程中，不因其名称之别而加以具体区分。

② 康熙《大清会典》卷2《内阁》；鄂尔泰、张廷玉等撰：《词林典故》卷2《官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58页。

③ 康熙《大清会典》卷3《吏部》；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3《吏部》。

④ 雍正《大清会典》卷7《品级》；永瑢、纪昀等撰：《钦定历代职官表》卷2《内阁上·国朝官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1册，第41–42页；《清高宗实录》卷8，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己卯。

⑤ 姚念慈：《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89–290页；刘洋：《文苑近侍：清入关前大学士的职能角色与权力演变》，《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⑥《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戊午。

⑦ 姚念慈：《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第291页。

章由部院大臣照常面奏、皇帝御览后，由皇帝亲自批旨，再下内院发科。[①] 同年十月，又以部院本章繁多，若竟送内院，容易滋生弊端为由，命议政王大臣会议更议办法，最终根据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的提议，在太和门内择一便室，令内院大学士、学士更番入直，协助皇帝批答本章，“本章或上亲批，或于上前面批，若有应更改之事，即面奏更改”。[②] 此即“太和门批旨”。先行研究认为，“太和门批旨”是将本章批答流程中的皇帝御览和内阁票拟两个程序合而为一，从而使大学士等人独立负责的票拟变成单纯的“缮旨”，大学士、学士入直太和门，严格来说，并无票拟。[③] 然据谈迁的见闻，此番改制，乃缘于此前顺治帝令大学士分班入大内票拟，并赐内膳，引起满洲贵族的疑忌，故令学士内直，以分割大学士之权。学士内直，除代为“书红”外，还包括“预阅章奏”和“呈旨”。[④] 另外，谈迁还明确提到，学士内直的职责为参与票拟。[⑤] 可知，大学士、学士内直并非简单的“缮旨”，同时还参与票拟，而且后者更为重要。不过，“太和门批旨”实行之初，大学士、学士的票拟范围还比较有限，大约从顺治十一年三月开始，内院才逐渐恢复了对部院本章的独立票拟之权，可不在御前进行票拟。[⑥]

按照顺治十年正月后的政务文书处理流程，大量本章须由皇帝御览后再进行批答，而在顺治十七年五月后，一切内外奏疏均先经御览再下内阁票拟。[⑦] 由于章奏繁多，顺治帝实际上无法详阅，御览的实质意义更多是决定是否下阁，而详览之责则落到负责票拟的大学士、学士身上。故在票拟前，大学士、学士等必须详细阅看本章、斟酌处理意见。正如顺治十六年谕旨所说的“公同看详，斟酌票拟”，“详酌事情，明晰票拟”。[⑧] 至于票拟意见，亦须由大学士、学士一起“参酌佥同，然后定议”。[⑨] 学士之地位因此变得尤为亲要，成为与大学士“并绾机密章奏”的“论思密勿之臣”。[⑩]

另一方面，学士获得批红之权。学士获得批红权的时间，以往认为是在顺治十年、十一年之交。[⑪] 但细绎顺治十年正月上谕所云“各部院奏事，经朕面谕者，部臣识其所谕，回署录之票签，送内院照票批红发科，如此则错误必多”，可知在此之前部院本章已是先由内院批红后发科。[⑫] 由于当时大学士、学士之间的职掌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很多事情都是大学士和学士共同承担、集体完成的。故学士很有可能在此之前即已参与批红，而不必迟至顺治十年之后。顺治十年正月决定的部院本章由皇帝亲批，涉及的不仅是收回部院录旨之权，同时也将原先赋予内院的批红之权收回皇帝手中。至于同年十月确定的大学士、学士分班内直批旨，则是将批红变为大学士、学士协助皇帝进行。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随着内院对部院本章独立票拟之权的恢复，大学士、学士逐渐形成了相对明确的分工，票拟主要由大学士负责，批红则主要由学士承担。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皇帝的本章批答压力。到顺治朝后期，顺治帝已经脱离了实际的批

---

① 《清世祖实录》卷 71，顺治十年正月甲戌。

② 《清世祖实录》卷 78，顺治十年十月戊子。

③ 姚念慈：《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第 302–303 页。

④ 谈迁：《北游录》，汪北平点校，中华书局，1960 年，第 371 页。

⑤ 谈迁：《北游录》，第 403 页。

⑥ 姚念慈：《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第 303–306 页。

⑦ 顺治帝亲政后，题奏本章的进呈和批答流程发生了多次变化。相关研究参见李文杰：《清代的“早朝”——御门听政的发展及其衰微》，《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 年第 1 期；姚念慈：《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第 301–307 页；郑旦：《清朝内阁票拟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第 36–44 页；张一弛：《清前期本章进呈与批答制度的演进》，《清史研究》2021 年第 5 期。

⑧ 《清世祖实录》卷 126，顺治十六年五月己巳。

⑨ 《清世祖实录》卷 137，顺治十七年六月己亥。

⑩ 计东：《改亭文集》卷 13《胡宛委先生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9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243 页；王熙：《王文靖公集》卷 12《胡宛委息游堂诗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09 册，第 262 页。

⑪ 姚念慈：《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第 309 页。

⑫ 《清世祖实录》卷 71，顺治十年正月甲戌。

写工作，本章的裁决由原来的“凡一应章奏，皆朕亲为批断”变为“凡有改正，皆朕亲裁”，① 批红成为学士独立承担的职责。王士禛在谈及明清票拟与批红制度之间的差异时称，清初本章票拟形式虽然沿袭明代旧制，“而批红则内阁学士之职”。② 从表面上看，顺治后期本章的票拟与批红虽同属内院（内阁），但批红由学士独掌，实则是一种内部相互制衡手段。

此外，学士还获得向皇帝面陈政事甚至是秘密交流的权力。谈迁提到，在“太和门批旨”实行之后，满洲出身的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因“性敏辨，通经史大义，善国书”而“日侍顾问，促膝造对，最被眷注”，汉人出身的礼部右侍郎兼内秘书院学士胡兆龙与麻勒吉相善，“又同教习庶吉士，益相欢，遂日入禁中，同议机密，虽内院（大学士）不如也”。③ 计东提到，胡兆龙在顺治朝任内院（内阁）学士时，“凡启赞朝庙、军国事甚多，其裨益民生之功甚巨，然其讦谟甚秘，世莫得而闻”。④ 可见胡兆龙等人参与机密之深。胡兆龙的同官王熙在学士任上也有“屡有面奏及奉谕询问密封奏折”的情形。⑤ 尽管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需要以及皇帝对学士的信任程度，但已足可证明学士地位之亲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内院（内阁）学士在顺治朝已经获得参与票拟及批红的权力，成为地位亲要的天子近臣，但由于满汉政治、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以及统治者鉴于明代阁权过重和内监批红乱政的教训，处处防范内院（内阁）专擅，内院（内阁）始终未能成为政务决策中枢，大学士、学士的职权和作用仍受到较大的限制。

二、康熙朝内阁学士职掌的扩充与地位的提升

康熙帝即位之初，鳌拜等人辅政，一切政务“率循祖制，咸复旧章”，⑥ 不仅内阁名称为内三院取代，功能回归“旧制”，大学士、学士内直之制亦为辅助大臣内直替代。此为清初政治演进中的重要环节。李之芳在康熙八年的奏疏中提到：

> 世祖皇帝时，内院诸臣俱在内直办事，凡部院衙门启奏本章即日看详票拟，世祖皇帝面赐裁决，严密神速，法诚至善。自顺治十八年以后，内辅臣在内直，内院遂移居外署，其各衙门本章俱至次日看详，且近日进呈，止有学士，而无大学士，于古人设官、世祖立法之意俱不相符……臣请敕令内院满汉大学士、学士仍在内直看详，本章即日票拟，公同进呈，候旨裁决。⑦

如李之芳所言，在鳌拜等人辅政时期，机务决于辅政大臣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院被移居外署，大学士、学士虽仍参与本章看详票拟，但实际上已经被排除于核心决策之外；⑧ 康熙帝亲政之初，学士重新得以参与本章“进呈”，实即恢复了内直候旨、批红，而大学士不与。上述情形，一方面是满洲贵族对顺治后期日益权重的内院（内阁）和汉人大学士的忌惮，而以满人为主的学士参与进呈候旨，可免专擅之弊，另一方是由于章奏的处理需要学士的协助。求其实质，则仍是满洲贵族出于对内院（内阁）和大学士专擅的防范，为当时尖锐的满汉矛盾所致。

与此同时，内院的批红权也被分割。康熙帝即位之初，挑选内务府笔帖式出身的满洲中下

---

① 《清世祖实录》卷 73，顺治十年三月戊辰；《清世祖实录》卷 135，顺治十七年五月壬午。

②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 2《批旨》，勒斯仁点校，中华书局，1982 年，上册，第 32 页。

③ 谈迁：《北游录》，第 403 页。

④ 计东：《改亭文集》卷 13《胡宛委先生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97 册，第 243 页。

⑤ 王熙：《王文靖公集·年谱》，《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09 册，第 443 页。

⑥ 《清圣祖实录》卷 3，顺治十八年六月丁酉。

⑦ 李之芳：《李文襄公文集》卷 2《政本关系甚重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80 册，第 23 页。

⑧ 安熙龙指出：尽管鳌拜等人在内三院人员构成上否定了顺治时普遍实行的满汉复职制，确立了以满洲官员为主的官员比例，清晰地展示满洲人的优势，但“内三院在鳌拜辅政时期却是与决策过程分离了”。安熙龙：《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陈晨译，董建中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95 页。

级文职官员在内廷行走，甚至设立批本处，“专司批发之责”。[①] 这些官员被称为批本官，负责满文批红，学士则负责汉字批红。满汉字分批之制由此形成，其后的本章批答程序变为：本章处理意见请旨裁定后先付批本处官员批写满字旨意，再发下内院（内阁）由学士批写汉字旨意。这一以内制外、以满制汉的复式批红制度的产生，实质上是鳌拜等满洲权贵出于防范内院（内阁）专擅、分割内院（内阁）批红权的一种举措，使内院（内阁）批红从此成为例行程序。

虽然顺治帝去世后，中枢决策机制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学士、学士职权受到贬抑，但康熙帝亲政后，内阁得以复设，并成为“掌宣纶綍，赞理庶政，职任綦重”的“机务要地”，[②] 大学士成为辅助皇帝处理政务最重要的助手，而学士作为内阁中地位仅次于大学士的高级职官，被赋予更多的职能，参与机务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在政务运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时人及后人将之视同于唐宋时期的参知政事，甚至称之为“次相”。[③] 计东在康熙十二年左右所撰的《胡宛委先生传》中称：“本朝学士同大学士并绾机密章奏，如唐宋参知政事，最为亲要。”[④] 康熙年间任内阁中书的张永铨认为：“内阁学士之设，昉于明之文庙时以讲读纂修之臣与议机务，即古所谓同平章事、参知政事者也。考其职虽下丞相一等，而实与丞相共操燮理之权，同备公孤之选，其位綦重。”[⑤] 这并非刻意夸大，妄作比附。郭棻在康熙中叶担任内阁学士期间，针对彼时内阁“惟听中堂主裁，阁学往往无所轩轾”的情形，提出质问：“阁学，古之参知政事也，若唯诺相随，不发一语，何参知之有耶！”[⑥] 可见，参知政事也是学士对自身职能和角色的自我定位。不仅如此，康熙帝也明确将学士界定为“公同理政之臣”“参赞政事之官”“议政之臣”，并曾多次申明“学士职任机要”，“学士之任甚为紧要”。[⑦]

然而，关于内阁学士的职掌，康熙朝的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概括。综合康熙《大清会典》等文献资料和《康熙起居注》等记载的实例来看，康熙九年复设内阁后，内阁学士的本职工作大致包括：参与本章票拟，参与御门听政，翻译与改写本章，批红、勾决重囚，传宣谕旨、给发敕书，监视用宝、封印、洗宝，撰拟恩诏、改写世袭官员赏册，办理典礼、祭祀等有关事宜。总体而言，内阁学士的职掌以协助大学士辅助皇帝处理以题奏本章为核心的日常政务为主，所谓“馆阁学士之职，主于赞画机枢，分裁文献”。[⑧] 在诸多职掌中，参与票拟和御门听政最为重要，是学士参政的主要体现，其余各项不过例行公事，并无实际含权量。

康熙八年后，随着大学士、学士内直之制的恢复和内阁地位的确立，章疏票拟主之内阁，票拟成为内阁最重要的职掌。与此前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是，学士参与票拟成为一项明确的制度。康熙《大清会典》载：“凡内外衙门启奏本章并各官条奏，有满文者，大学士、学士公同票拟进呈请旨，如止有汉文、蒙古文者，发中书翻译（或全译，或止译贴黄），侍读学士、侍读校正对阅，送大学士等票拟进呈请旨。”[⑨] 按程序，票拟之前首先需要对本章进行详细审阅。“凡各部院衙门本章俱系国家紧要，朕恐有阅视未详者，启奏本章大臣各官当愈加谨慎。至大学士、

---

① 昭梿：《啸亭续录》卷 1《批本处》，昭梿：《啸亭杂录》，何英芳点校，中华书局，1980 年，第 396 页。据学者研究，内廷批本处大约设立于康熙元年。（张一弛：《清前期本章进呈与批答制度的演进》，《清史研究》2021 年第 5 期）

② 康熙《大清会典》卷 2《内阁》。

③ 王用臣《幼学歌》：“内阁学士称次相，亦曰阁学。”（卷 4《人事门下 · 各衙门官职称名 · 京官各官职》，光绪乙酉深泽王氏刻本，第 17 页）梁章钜《称谓录》：“考内阁学士亦称次相，以为贰公。”（梁章钜：《称谓录》卷 12，吴道勤、邱运华点校，岳麓书社，1991 年，第 161 页）

④ 计东：《改亭文集》卷 13《胡宛委先生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97 册，第 243 页。

⑤ 张永铨：《闲存堂文集》卷 1《贺平阳王诚居夫子擢内阁学士兼少宗伯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52 册，第 456 页。

⑥ 潘应宾：《上谷宗伯学士郭文清公棻传》，钱仪吉纂录：《碑传集》卷 18，光绪十九年江苏书局校刊本。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 1 册，中华书局，1984 年，第 680 页；《清圣祖实录》卷 104，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丙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 2 册，第 1026 页；《清代起居注册 · 康熙朝》第 6 册，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9 年，第 3378 页；《清代起居注册 · 康熙朝》第 15 册，第 8496 页。

⑧ 朱方增：《从政观法录》卷 6《大学士李光地》，《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4 辑第 17 册，北京出版社，2000 年，第 125 页。

⑨ 康熙《大清会典》卷 2《内阁》。

学士等亦宜各尽心勤慎，细加看视。”[①] 大学士、学士均有审阅本章之责，而学士之责更为紧要。康熙帝曾有谕旨，学士作为随从大学士办事之人和皇帝“朝夕接见近臣”，“详查字义及细阅本内词语”是其专责。[②] 即使是皇帝已经批发的本章，乃至是已经批红发出的本章，康熙帝也要求大学士、学士“务加公同详阅”，认真复核。[③] 这一方面是由于题奏本章在国家政务运作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康熙帝对本章处理的重视，另一方面表明彼时学士对皇帝和内廷批本处的批红仍有复核之责和纠驳之权。

御门听政作为康熙朝国家政务处理的主要方式，在中枢决策和政务运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听政地点由皇帝起居之处决定，在京以乾清门、瀛台勤政殿和畅春园澹宁居为多，外出巡幸时则在行宫或行幄举行。[④] 从内容与形式来看，康熙朝的御门听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皇帝听取各部院官员面奏政事、收取本章，属于皇帝听政环节，在这一环节，学士负责接收御前发下的本章；第二阶段是皇帝与内阁大臣讨论折本事项的处理，属于议政环节，可称为御门议政。所谓“折本”，是指经内阁票拟进呈，皇帝未给出处分，而折其票签一角，留待进一步处理的部院本章。折本涉及用人行政、刑名、河务、军政等事项，关系重大。康熙帝曾谕：“朕每日听政，一切折出票签应商酌者，皆国家切要政务，得失所系。”[⑤] 故就整个御门听政而言，商议折本的环节更为重要，是真正进行机务决策的阶段和御门听政的重心所在。

参与御门议政是内阁大臣参与机务的重要体现。不过以往研究多强调大学士尤其是满洲大学士在其中的作用，对学士的参与及其作用有所忽视。实则在康熙朝的御门听政中，内阁学士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商议折本的过程中，康熙帝在很多事项上都会主动征询内阁学士的意见，目的在于使施政更加平允得当。他曾谕大学士等：“一切政事皆国计民生所关，最为重大，必处置极当，乃获实效。朕每详览奏章，内有所疑，或折五六本、七八本咨询尔等者，务欲得至当耳。”[⑥] 同时，康熙帝还鼓励、要求学士积极发表意见，共同参酌。如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在御瀛台门听政，讨论吏部题请议处原任高州府知府李棠的折本时，康熙帝谕大学士等：“学士乃系内阁参赞办事之官，如有所见，应行启奏。近观并无与议者，若惟送本接本，用一笔帖式足矣！何必设立学士？兹后各有所见，俱着敷陈。”[⑦] 又如康熙二十二年闰六月二十三日外出巡幸，在行幄与学士商议折本事宜时，康熙帝谕学士阿兰泰等：“内阁最为机要之地，尔等亦议政之臣，宜各抒胸臆，直言无隐，但求事当于理，互相商酌。即小有得失，亦复何伤！”[⑧]

通过御门听政，学士获得与皇帝、大学士面商朝政的权力，可以就相关事项发表意见，从而对政务运作和一些重大决策的制定及其实施产生影响。李光地在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五年任内阁学士期间，在御门听政时就多有建白，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举荐施琅和进取台湾的建议，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清廷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⑨] 统一台湾后所实行的驻防兵丁更番之制（或称班兵制度），也是康熙帝御门听政时根据李光地的建议最终确定下来的。[⑩]

相较于在宫中、瀛台和畅春园的御门听政，学士在皇帝外出巡幸时举行的听政中所发挥的作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 3 册，第 1728 页。

② 《清代起居注册 · 康熙朝》第 16 册，第 8995–8997 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 1 册，第 680 页。

④ 徐艺圃：《试论康熙御门听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 年第 1 期；郭成康：《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 政治卷》，辽海出版社，1998 年，第 9–20 页；王薇：《御门听政与康熙之治》，《南开学报》2003 年第 1 期；冉琰：《再谈康熙御门听政》，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编：《民族史研究》第 6 辑，民族出版社，2005 年，第 278–294 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 84，康熙十八年九月甲寅。

⑥ 《清圣祖实录》卷 110，康熙二十二年六月癸亥。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 2 册，第 874–875 页。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 2 册，第 1025–1026 页。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 1 册，第 740 页；第 2 册，第 845–846 页；第 3 册，第 1528–1529 页。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 11《本朝时事》，李光地：《榕村语录　榕村续语录》下册，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1995 年，第 701–704、707 页。

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 2 册，第 1530 页；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 11《本朝时事》，第 709–710 页。

用更为明显。由于少有部院大臣随行，外出期间举行的御门听政一般没有听取部院衙门奏事和收取本章的环节，只有皇帝与随行内阁大臣商议折本的环节。同时，由于随从的大学士人数较少，有时甚至没有大学士随行，学士便成为皇帝处理折本事项的主要助手，学士的意见也不时得到康熙帝的重视，影响到康熙帝的决策。如康熙二十二年闰六月十七日，时外出驻跸红川，康熙帝御行宫，与随行内阁大臣商榷折本，其中一件为京口将军杨凤翔题请保留裁汰防御而兵部议不准之事。康熙帝由于不知镇江地方是否较他处紧要，因问曾前往查勘海界的学士佛伦，佛伦奏称“镇江地方虽当要冲，乃系内地，非他处边界可比，似应照部议”，被康熙帝采纳。① 又如康熙三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在热河行宫举行的听政中，扈从大学士、学士以折本请旨，其中一本为吏部题补内阁学士员缺，开列侍读学士查赉等职名。康熙帝问扈从内阁学士罗察：“查赉其人如何？”罗察对以查赉为人颇优，为司官时办事优长，而且通晓汉字。康熙帝遂令查赉补授。②

此外，通过参与御门听政，学士成为皇帝朝夕接见的亲近大臣，这对于学士政治地位的提升和升迁亦有重要意义。

三、雍正朝以后内阁学士职掌与地位的弱化

雍正朝以后，内阁学士的职掌和地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学士不再参与票拟和议政，失去了共同议政之臣、参知政事的地位，职掌集中在一些并无实际含权量的例行事务上，逐渐沦为事务清简的“冗员”。

（一）不与票拟与议政之权的丧失

参与票拟在顺康时期是内阁学士最重要的职掌，在康熙朝更是有明确的制度保障，也为皇帝所重视。雍正前期，学士仍参与本章的票拟。③ 雍正中叶以后，学士逐渐丧失了对本章的票拟权。到了乾隆中期成书的《大清会典》中，关于章疏票拟的条文变成了：“各部院及直省题疏到内阁，大学士票拟进呈，得旨，转下六科钞发各部院施行。”④ 题本的票拟成为大学士的专责，学士不得参与。同时期成书的《中书典故汇纪》更加明确地提到：“内阁学士衔兼礼部侍郎，其制似同古中书侍郎，而不知政事，即拟票亦不与焉。故大学士奏事不列学士衔名，所掌不甚重也。”⑤ 在后来敕撰的《钦定历代职官表》中，“不预票拟”成为描述内阁学士职掌与地位的一个重要标签。⑥

不仅如此，学士还丧失了议政之权。在雍正朝以前，学士参议政事的方式包括参与章疏票拟意见的讨论和御门听政时折本的商酌，以及与各部院、九卿等会议有关重要事项。雍正朝以后，学士除不再参与票拟外，也不参与重要政事的会议。同时，雍正帝即位后，虽然继续实行御门听政，但次数大为减少。而且，随着专制皇权的强化，御门听政时折本事项多由皇帝直接裁决，很少需要征询大学士、学士的意见，因此《雍正起居注》中记载的折本事项处理结果多数是以“内阁奉上谕”“大学士奉上谕”的形式出现，很少能够看到皇帝向大学士、学士等征询意见，与大学士、学士等商议折本的情形，大学士、学士失去了参与商榷折本的权力。到了乾隆朝，皇帝与内阁大臣商议折本的环节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在御门听政过程中，学士除宣读折本外，毫无所事，大学士除负责记录旨意外，极少能有所商榷、赞画于其间，折本事项处分完全由皇帝独自裁断。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 2 册，第 1024 页。

②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11 册，第 5896–5898 页。

③ 雍正《大清会典》中关于题奏本章票拟程序的条文与康熙《大清会典》完全一致。见雍正《大清会典》卷 2《内阁》。

④ 乾隆《大清会典》卷 2《内阁》。

⑤ 王正功撰，赵辑宁校补：《中书典故汇纪》卷 2《职掌上》，《续修四库全书》第 74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76 页。

⑥ 永瑢、纪昀等撰：《钦定历代职官表》卷 4《内阁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01 册，第 90 页。

（二）学士批红的演变

在康熙朝，由于内廷批本处的设置，内阁学士的批红只是例行程序而已，在雍正朝以后却变成内阁学士最主要的职掌之一。与此前相比，学士批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票拟与批红分属大学士与学士。“内阁大学士拟票而不票红，票红乃学士之职，故大学士无朱笔。”① 其次是汉字批红成为汉学士专司之事。康熙时，满学士、汉军学士参与批红的现象不时有之，但雍正以后，汉字批红为汉学士独掌，“汉学士职票红，无他事”。② 乾隆五十三年（1788）七月，汉人侍郎谢墉、吴玉纶因此前在学政任上营私舞弊被降调为内阁学士，乾隆帝所降谕旨中说：“谢墉、吴玉纶何以复胜卿贰之任，均著降调为内阁学士，其职不过专司批本，并无应办紧要之件。”③ 可见，批红已成为汉学士最主要的工作内容。乾隆《大清会典》将内阁学士的职掌归纳为“敷奏本章、传宣纶綍”。④ 其中“传宣纶綍”即批红，乃汉学士之职。嘉庆朝所修《大清会典》对满、汉学士主要职掌的界定更加明确：“学士满洲六人，掌奏本章、请御宝；学士汉四人，掌批本。”⑤ 再次是协同批本之制的形成。雍正中期以后，内阁学士差遣频繁，批本乏人，不得不选人代理，由是逐渐形成协同批本之制。《词林典故》云：“内阁学士职在批票本章，或遇奉使、请假，需人代理，则以翰林、詹事、坊局官及京堂之曾任翰林者请简一二员暂行兼摄，俟学士回署时受代而还。谨按：暂摄之制起于雍正八年十月，至乾隆九年七月、十一年九月，阁臣皆循例请行。”⑥ 协同批本之制的形成，表明内阁学士地位的下降，同时也意味着题本批红重要性的降低。

协同批本之制形成后，汉字批红更趋形式化，学士不过循例而行，事务更为清简，一些人虽获任内阁学士，但并不到阁批本。方苞在雍正十一年被授予内阁学士时，以腿脚不利为由推辞不受，雍正帝命其专门负责修书，不必到阁治事。⑦ 道光十八年（1838），徐士芬、杜受田由翰林院侍讲学士升任内阁学士，道光帝特谕内阁，令二人在上书房专心授读，“毋庸到阁批本”，批本另派人代理。⑧ 后来甚至又出现供事代批的现象，汉学士之责更为简易。翁同龢在同光之际两任内阁学士，其第一次任期自同治十年（1871）七月初三日至十二月底，但并未到阁批本；第二次任期自同治十三年十一月至光绪二年（1876）正月，约两年又两个月，前后共到阁30次，其中批本28次、会议1次、捧贺表1次。⑨ 光绪元年四月十三日，翁氏第一次到阁批本，其日记中写道：“辰初到内阁批本，盖两任来此为第一日，凡画者廿三件，批者廿余件。近例供事代批，不过阅对一过而已。”⑩ 可见学士批红完全成为无关紧要的例行程序。由于协同批本和供事代批的实行，汉学士的职任变得无关轻重，故即使汉学士出缺或全部出差，“亦不必派署”。⑪

（三）御门听政中学士职掌的变化

在康熙朝的御门听政中，学士负责接本，启奏折本，并参与商议折本。其中启奏折本又称敷奏折本、读本，即御门听政时在御前宣读折本。自康熙初御门听政成为定制后，启奏折本便成为内阁学士的主要职掌之一。然从雍正朝开始，除不再参与商议折本外，学士所承担的启奏折本职能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启奏折本成为御门听政时学士的唯一职能；⑫ 另一方面，

---

① 王正功撰，赵辑宁校补：《中书典故汇纪》卷4《仪式》，《续修四库全书》第746册，第216页。

② 叶凤毛：《内阁小志》，《续修四库全书》第751册，第276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1308，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己巳。

④ 乾隆《大清会典》卷2《内阁》。

⑤ 嘉庆《大清会典》卷2《内阁》。

⑥ 鄂尔泰、张廷玉等撰：《词林典故》卷3《职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9册，第486页。

⑦ 《清史稿》卷290，中华书局，1977年，第10270页。

⑧ 《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第53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第30985、30988-30989页。

⑨ 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2卷，中西书局，2012年，第898-931页；第3卷，第1120-1220页。

⑩ 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3卷，第1162页。

⑪ 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7，《续修四库全书》第1165册，第101页。

⑫ 雍正六年九月，内阁学士在御门听政中所承担的接本职责为内阁侍读学士取代。见《清世宗实录》卷73，雍正六年九月乙丑。

启奏折本成为满学士的专责。康熙时，折本由大学士与学士共同面奏请旨，彼时汉军学士也有启奏折本的情形。自雍正朝开始，御门听政成为皇帝“法祖”的一种仪制，宣读折本和皇帝降旨均以满语进行，启奏折本便成了满学士的专责。嘉庆十年（1805）七月，嘉庆帝给内阁的谕旨中说：“内阁学士并无别项差使，惟逢朕御门理事时，应行跪奏本章。”① 可见，启奏折本已成为满学士最主要的职掌。

关于启奏折本的程序和仪制，康熙朝的文献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载，此缘于当时御门之制尚未完备。至雍正初，“始定御门之制”，建立起比较整肃的御门听政之仪。② 关于启奏折本的程序，叶凤毛《内阁小志》中有比较详细的叙述：

> 满学士亦阅本，皇上御门日，跪于前读折本。凡折之本，节其略数语翻作清语，诸学士预诵熟。至期，票签以绿头牌列六学士名，请点一人读本，点出之人俟各部院进本讫，侍读学士捧本下阶讫，于是大学士率学士上阶，东面列跪，读本之学士捧折本置御前炕桌上，北面跪，举起一本，清语背诵，候上降旨（中堂默识），复举一本如前，毕，退。侍读学士升阶捧本，亦退。大学士等俱退。驾还宫，大学士将所记旨命中书舍人缮呈，报可，乃缮入票签更进。③

上述材料中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启奏折本并非照本宣读，而是将本中的要点翻译成满语进行奏读；第二，启奏折本的满学士由皇帝在御门临期时点出，属于随机点取；第三，启奏折本以背诵的方式进行，学士需预先将折本要点“诵熟”。因此，启奏折本对满学士亦是一种考验。乾隆初年成书的《八旗通志初集》中称，启奏折本“必心通默识，奏对明敏者，乃无违误”，甚至发出“满学士之任，亦未易也”之叹。④ 这种情形出现在雍正朝以后，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雍正朝以前，清廷在“首崇满洲”国策下，大力推行“国语骑射”政策，满洲官员的满语能力尚维持在较好的水平，宣读折本并不困难。雍正朝以后，尽管统治者采取多种措施，竭力维护满人“国语骑射”能力，但由于承平日久，满汉交融，旗人多习汉语，满语反而生疏，启奏折本因此成为难事。乾隆时御制御门诗中有“每看背本省郎难”之句，其注云：“内阁学士奏折本率系背诵，凡记忆未熟及清语生疏者，往往遗忘、讹舛，视为难事。”⑤ 一些满学士因此被革职。乾隆朝以后，旗人的满语能力进一步衰退，满学士因满语生疏不能读本而被处分的情况屡见不鲜，不仅有因不能读本而在御门临期借口生病请假逃避读本的现象，⑥ 甚至有因未娴满语、担心因读本错误获咎而自请开去学士之职的情形。⑦

（四）乾隆朝以后内阁学士的新增职掌

随着汉学士批本、满学士读本这一相对明确的职责分工模式的形成，满汉学士的主要职掌基本固定下来，一直延续至清后期。与此同时，从乾隆朝开始，内阁学士又陆续增加了一些新的职掌，主要包括稽察中书科事、阅本、稽察本章等。

（1）稽察中书科事

清代中书科始设于顺治初年，为专司缮写册宝、诰敕等事的机构。在雍正朝以前，中书科独立于内阁，设有满汉中书（原称中书舍人）若干人，推资俸深者满汉各一人分别为掌印、掌科。雍正初年，中书科成为内阁的下属机构。乾隆三十六年增设管中书科事汉内阁学士一员，次年又改管科事为稽察科事，并增设满洲内阁学士一员。⑧ 自此，稽察中书科事成为内阁学士的职掌之一。乾隆后期敕撰的《钦定历代职官表》将内阁学士视同于唐宋时期负责制造的中书舍

---

① 《清仁宗实录》卷147，嘉庆十年七月壬子。
② 《钦定皇朝通典》卷52《礼·嘉二·御门听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3册，第25页。
③ 叶凤毛：《内阁小志》，《续修四库全书》第751册，第275页。
④ 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116《八旗内阁大臣年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964页。
⑤ 于敏中、英廉等编：《钦定日下旧闻考》卷13《国朝宫室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7册，第188页。
⑥ 《清仁宗实录》卷147，嘉庆十年七月壬子。
⑦ 《清仁宗实录》卷43，嘉庆四年四月癸丑；卷146，嘉庆十年闰六月甲申。
⑧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6《中书科》；叶凤毛：《内阁小志》，《续修四库全书》第751册，第280页。

人，“司制诰”也成为描述学士职掌的一个标签。[①]

需要指出的是，清代中书科虽为专司诰敕的机构，但其职事甚属简易，自康熙初年封赠诰敕文式定型以后，直至清末，中书科所承担的制诰工作都只是照规定的成式“按品缮轴”，实际上并无多少技术含量。学士稽察科事，也并非亲自经手诰敕，而主要是稽查中书等人是否按限完成缮写诰敕的任务。清中后期敕修的《大清会典》将稽察科事内阁学士的职责描述为：“掌稽察中书科之事，领发册轴，考察保送属官及关支公费、役食等事，稽察学士与大学士同列衔画稿。”[②] 可见，稽察科事内阁学士所掌不过一般的庶务而已，实无关重轻。

（2）阅本

阅本，又称看本，即阅看本章，是票拟的前提工作。雍正中叶以前，政务文书以题本为主，故题本看详至为重要，当时本章由大学士与学士共同阅看、票拟。雍正中叶以后，阅本发生较大变化。首先是内阁学士不再参与阅本，阅本成为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的专责。其次是从雍正十年开始，随着内外廷的产生，大学士阅本也发生分化，“大学士之充内廷者，例不看本”，不充内廷者，每日轮一人到阁阅本。[③] 乾隆朝以后，随着大学士兼职和皇帝园居之日增多，出现大学士“旷职”不到阁看本的现象，故嘉庆七年的谕旨重申不在内廷行走的大学士“俱著常川到阁阅本”的旧例，要求每日仍轮流一人到阁看本。[④] 这一体制一直延续至道光初年而“莫之有改者”。道光元年，当时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共有六人，到阁看本者三人，但到了道光二年以后，到阁看本的只剩托津一人而已。托津身兼数职，无法应付繁多的事务和本章，于是奏请选派内阁学士三人轮流看本，道光帝于是在道光五年正月命学士奕经等人每日轮流一人赴阁阅本，其满汉本签仍由托津核定进呈。托津之请本为权宜之计，但后来继任的大学士多“以兼摄事废本缺事”而不到阁看本，学士看本遂相沿成例。[⑤] 内阁看本之制由此为之一变，阅本再次成为学士的职掌。不过，道光五年后实行的学士轮流到阁看本，与顺康时期的学士看本相较，实不可同日而语。降至清末，看本更是成为学士专差，但由于常以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兼之，故在学士出缺、出差时，也不需派人署理其职。[⑥]

（3）稽察本章

清中期以前，为提高行政效率，设置了专门的行政文书稽察机构，并建立相应的稽察制度，但这些机构的稽察对象主要是各部院，而对内阁的办事效率尤其是本章进呈的问题，则缺乏相应的监督和稽察，是导致内阁行政效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清中期以后，内阁的办事效率备受诟病，本章积压的问题最为突出。这一方面是由于题本的不断增多，另一方面是内阁官员兼差过多，办本乏人，而更关键的是题本的重要性较之前大大降低，办本人员消极对待，因循玩忽，导致本章积压稽延，办本效率低下，直接影响行政效率。同治三年，御史贾铎奏请剔除积弊、整顿吏治，其中提到各省题补州县本章送交内阁后，并未按限票签进呈，“有不过十日半月即送至票签票拟者，有压至累月经年并不送票者”。清廷为此谕令大学士严饬内阁汉本房，在各州县补缺题本到阁后，专立档簿登记日期，挨次翻译票拟进呈，从收本到进呈不得超过一个月，同时建立学士稽察本章之制，令内阁每年奏请钦派内阁学士、侍读学士各两员常川赴阁，稽查档簿，如有逾限，即行严参。[⑦] 由此，学士稽察本章成为定例。这一创制虽然健全了行政文书的稽察体制，但终究只是内阁的一种自我稽察方式，实际作用非常有限。文廷式提及光绪时的情

---

① 永瑢、纪昀等撰：《钦定历代职官表》卷4《内阁下》、卷3《内阁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1册，第90、95、76页。

② 嘉庆《大清会典》卷3《中书科》；光绪《大清会典》卷3《中书科》。

③ 龚自珍：《龚定盦全集·定盦文集补编》卷2《上大学士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3册，第550页。

④ 《清仁宗实录》卷99，嘉庆七年六月癸亥。

⑤ 龚自珍：《龚定盦全集·定盦文集补编》卷2《上大学士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3册，第550–551页；《清宣宗实录》卷78，道光五年正月丙辰。

⑥ 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7，《续修四库全书》第1165册，第101页。

⑦ 《清穆宗实录》卷97，同治三年三月壬子。

形："内阁学士稽察本章例派二人，一年一易，不分满汉。近年以来多派满阁学，然亦无所事事也。"① 可见，学士稽察本章最终亦不免流于形式，本章积压、办本效率低下的情形始终未得到有效解决，这是光绪末年"改题为奏"的重要原因。②

（五）影响内阁学士职掌与地位变化的主要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内阁学士的职掌与地位从雍正朝开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奏折的盛行与军机处的设立。一般认为，奏折作为一种政务文书，至迟在康熙中叶已经出现，在雍正朝得到广泛使用，并逐渐制度化，军机处则设立于雍正中叶，在乾隆朝发展成为固定的中枢决策机构。③ 奏折的盛行与军机处的设立导致清廷权力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对内阁影响甚巨，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是导致内阁职掌的收缩与地位的下降。奏折盛行后，机务要事由奏折奏闻，题本的地位随之下降，所涉多系寻常吏事。军机处设立后，逐渐发展成为承旨出政之所在，凡臣工奏折、机密重务由军机大臣协助皇帝处理。由于"政本悉出机庭"，"大政由枢臣承旨"，内阁被排除在机务决策之外，职掌局限在处理例行政务范围之内，权任渐轻，地位随之下降，阁臣甚至被视为"闲曹冗员"。④ 二是内外廷之分的出现，大学士在外廷者专司题本的看详与票拟。这一体制后续发展变异的结果即是外廷大学士不能常川到阁阅本，于是有学士看本之制的产生。三是导致内阁本章处理及人员分工发生变化。有清一代，内阁的职责始终以票拟题本为主。雍正中叶以前，大学士、学士共同经手票拟。雍正中叶后，随着奏折的盛行和军机处的设立，题本重要性大降，内容多系例行事件，并非机密要务，清初统治者所担忧和防范的内阁权重专擅的问题彻底失去了产生的基础，以学士分割大学士票拟之权的做法也变得毫无意义，于是票拟由大学士负责，学士不与。乾隆时期，随着专门负责办理本章的"五所"（又称"五房"）的出现，内阁机构得到健全，内部分工和办本程序发生显著变化，撰拟、缮写票签由票签处中书和侍读经手，然大多是循例而行、依样画葫芦，大学士不过审阅而已。"票拟皆舍人按故事为之，大学士晨入画可否，然少所更定。"票拟程序亦变成："舍人阅已，先书草签，侍读详看，大学士审定之，舍人以所草登于籍，谓之草签簿，随书真签。"⑤ 由于票拟权责下移，中书和侍读成为票拟的实际操持者，侍读因此成为"阁中要职"，号称"阁长"，而学士由于不参与票拟，在阁中地位不如侍读紧要，以致有"阁学不大，阁长不小"之语。⑥

其次是御门听政的式微。随着奏折的大盛和军机处的设立，御门听政也日渐衰微。一方面，御门听政次数不断减少。雍正朝开始，特别是军机处设立之后，皇帝理政方式发生较大变化，主要是每日召对臣工和批阅奏折，"并非专待御门之期始综理庶务"，⑦ 所以御门听政次数日益减少。雍正年间，御门听政由原来的每日举行，变为不定期举行的朝会。乾隆时，由于题本奏报政事大规模被奏折取代，折本的数量随之减少，御门听政的次数也大规模减少。嘉庆时期，御门听政的举行完全取决于折本的数量，次数大幅锐减，至同治朝后不再举行。⑧ 御门听政次数的减少乃至停止，使学士失去了皇帝每日接见近臣的地位，满学士最主要的职掌亦随之逐渐丧

---

① 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 6，《续修四库全书》第 1165 册，第 90 页。

② 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实行的改题为奏，主要是针对内阁办本效率低下的问题而进行的。参见《清德宗实录》卷 486，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戊申。

③ 学术界对清代奏折产生和军机处设立的具体时间有不同意见，参见刘文鹏、杨瑞：《百年清史研究史 · 政治史卷》，第 162–167、152–153 页。

④ 管世铭：《韫山堂文集》卷 3《冯玉圃同年鹤半巢诗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93 册，第 479 页；《清史稿》卷 114，第 3269 页；龚自珍：《龚定盦全集 · 定盦文集补编》卷 2《上大学士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573 册，第 552 页。

⑤ 席吴鏊：《内阁志》，《续修四库全书》第 751 册，第 267 页。

⑥ 一士：《内阁谈》，《中和月刊》第 1 卷第 6 期，1940 年。

⑦《清仁宗实录》卷 186，嘉庆十二年十月辛巳。

⑧ 李文杰：《清代的"早朝"——御门听政的发展及其衰微》，《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 年第 1 期。

失。光绪时所修《大清会典》仍将御门听政时宣奏折本作为满学士的主要职掌，不过是沿袭嘉庆《大清会典》的说法罢了。另一方面，御门听政逐渐形式化，功能不断弱化。康熙年间，御门听政是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方式，“当时御门，乃每日听政恒制”，但自雍正朝以后，御门听政变成视“折本所积，间一御门，以存旧章于不废而已”，[①] 逐渐流于形式，成为皇帝“法祖”和接见群臣、彰显勤政的一种仪制。同时，随着题本重要性的锐减，御门听政中折本的内容和处理也变得无关重轻。叶凤毛在提及乾隆时折本的改签时论道：“此典礼如是，其实改签降旨无事于此，特假以见群臣耳。”[②] 折本处理的形式化，使御门听政失去了商议重要政事的功能，对国家政务的影响微不足道。学士参与御门听政于其地位、权力而言变得毫无意义，不再是参与机务的体现。

最后是协办大学士的出现。协办大学士最早出现于雍正初年，至乾隆初年成为常设之职。雍正初年协办大学士的出现，主要是内阁事务繁忙而需人协助，而雍正中叶以后协办大学士的设置则主要是由于内廷的出现，亲信大学士在内廷行走，不能到阁办事，外廷大学士或奉他差，内阁事务需人协理。协办大学士产生后，尤其是成为固定设置后，取代了学士参知政事的职能与地位，成为协助大学士处理题本的主要助手，[③] 学士在内阁中的地位降至次要，不再参与本章票拟，沦为清简之职。

四、结论

清代内阁学士的固定设置，是其与明代内阁之间的一大差异。内阁学士的职能与地位在清代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内三院设立之初，实质是为皇帝处理文书的秘书机构，彼时的内院大学士、学士扮演的角色主要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入关前后，内三院地位虽然持续提升，但职权还相当有限，学士的角色和地位受到很大的限制。顺治帝亲政后，内院地位得到提高，作用得到增强，学士的地位也得到提升，得以分享章疏票拟与批红之权。康熙帝亲政后，学士参与政务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不仅继续参与票拟和批红，同时还参与御门议政，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成为职任紧要的参赞政事之臣。雍正朝以后，内阁学士的职掌和地位发生反转，失去了参与票拟和议政的权力，职权和地位逐渐弱化，成为“非繁剧之职”。[④] 尽管在乾隆朝以后除批红、启奏折本这两项主要职掌之外，内阁学士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职掌，但均属循分供职，无关要务，无改其渐趋衰弱的地位。到清后期，内阁学士的职责和日常事务更加简易，成为“大员中最无所事事者”。[⑤] 从整体上看，清代内阁学士职掌、地位的曲折变化过程与内阁权力的盈缩、地位的演变轨迹相一致，是内阁职权嬗变的一个缩影。

清代内阁学士职掌与地位的演变，背后有着复杂的因素。清初内院职权和地位受到较大限制，以及大学士、学士角色与地位的局限，主要是满洲政治文化传统、满汉之间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统治者鉴于明朝衰亡的历史教训而对内院刻意防范所致。康熙朝内阁学士职掌的拓展和地位的提升，一方面是由于中枢决策机制的变革和皇帝理政方式的变化，尤其是内阁制度的最终确立和御门听政的制度化开展，使内阁职权和地位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受益于皇帝的决策需要。雍正中叶以后内阁学士职权的弱化和地位的下降，既受政务文书、中枢决策机制、中央权力分配格局和皇帝理政方式等变化的影响，也是内阁职能调适、内部机构健全、职官设置和人员分工细化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清代内阁学士职掌与地位的演变是皇权不断强化的结果，堪

---

①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 5，童正伦点校，中华书局，2005 年，第 71 页。

② 叶凤毛：《内阁小志》,《续修四库全书》第 751 册，第 275–276 页。

③ 梁章钜《称谓录》：“今以大学士协办，为古之参知政事，故有称参知者，有称协揆者。”（梁章钜：《称谓录》卷 12《内阁大学士》，第 158 页）

④《清高宗实录》卷 119，乾隆五年六月丁亥。

⑤ 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 7,《续修四库全书》第 1165 册，第 101 页。

称清代皇权强化过程中职官角色、地位变异的典型案例。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清中期以后内阁学士的职掌与地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仍是职官系统中的重要存在，仍为人所看重。正如王正功所云：虽然清中期以后内阁学士“所掌不甚重”，“然简用卿贰多由于是，是以人皆羡之”。[①] 官至督抚、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者，不少均有内阁学士的任职经历。[②] 此外，在清后期，尽管内阁学士所掌本职无关重轻，但由于兼充职务和承担的差遣性事务较多，在建言献策、襄办军务、治理地方、对外交涉、办理洋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仍有不小影响，此亦不应忽视。

References

Guo Chengkang. “*Shiba shiji de zhongguo yu shijie: zhengzhijuan*”(China and the world in eighteenth century: volume of politics). Shenyang:Liaohai chubanshe,1998.

Liu Wenpeng, and Yang Rui. *Bainian qingshi yanjiushi zhengzhishi juan* (A history of research on the hundred years of Qing history: volume of political history).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2021.

Xu Yipu. “Shilun Kangxi yumentingzheng” (On emperor Kangxi’s hearing of state affairs in front of the palace gate). *Gugong bowuyuan yuankan* (Palace Museum Journal) 1 (1983).

Yao Nianci. *Dingding zhongyuan zhi lu: cong huangtaiji ruguan dao xuanye qinzheng* (The road to conquer the Central Plains: from Huang Taiji’s entry into the Shanhai Pass to Xuan Ye’s reign).Beijing: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 2018.

Zhang Yichi. “Qingqianqi benzhang jincheng yu pidazhidu de yanjin” (The submission and rescript of the routine memorials in the court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Qingshi yanjiu*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5 (2021).

The Evolution of the Duties and Status of the Secretaries of the Grand Secretariat in the Qing Dynasty

CHEN Yongxi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Guang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encyx123@163.com)

Abstract: The secretaries of the Grand Secretariat (内阁学士) of the Qing Dynasty originated from the academicians of the Inner Three Academies established before the Qing court entered the Shanhai Pass. Their duties and status underwent a complex process of change. Before and after the Qing entry, the powers and status of the academicians were significantly limited, primarily serving as literary attendants to the emperor. After Emperor Shunzhi took personal control of the government, the status of the secretaries was elevated, and they beg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drafting and approval of imperial edicts. After Emperor Kangxi took the reign, the scope and depth of the secretaries’ involvement in state affairs further expanded and their status was further enhanced, making them important political advisors. However, from the Yongzheng reign onward, influenced by changes in administrative documentation, central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distribution of central power, the emperor’s governing style, and the evolving role of the Grand Secretariat, the authority and status of the Secretaries gradually declined, eventually becoming idle officials with little real responsibility. Fundamentally, the tortuous evolution of the duties and status of the secretaries of the Grand Secretariat was the result of the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of imperial power.

Keywords: Qing dynasty, secretaries of the Grand Secretariat, duties, status, imperial power

---

① 王正功撰，赵辑宁校补：《中书典故汇纪》卷 2《职掌上》,《续修四库全书》第 746 册，第 176 页。

② 以军机大臣为例：《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列清代军机大臣 147 人，其中曾任内阁学士者计有 76 人；嘉庆朝以后任军机大臣者计有 100 人，其中 58 人有内阁学士的任职经历。